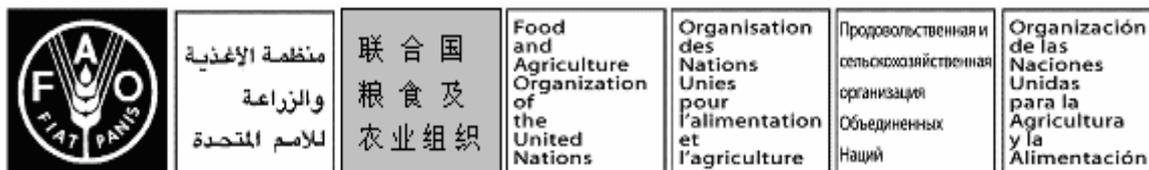


2009年11月



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09年11月18—23日，罗马

第二十六次麦克杜格尔纪念讲演

联合国充足食物权特别报告员 Olivier De Schutter 先生 发表的麦克杜格尔纪念讲演

总干事先生

诸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本人应邀在粮农组织大会议题讨论之初发表这次纪念演讲，为此深感荣幸。我愿与全世界所有为捍卫充足食物权而不辞辛劳努力奉献的人士分享这份荣幸。同时，能与曾经发表过纪念演讲的这些伟大人士站在一起，我又感到受宠若惊，他们为在世界上消除饥饿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将永远令我敬佩。

差不多正好五年前，各国政府在粮农组织理事会一致核准了《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自愿准则》，这份唯一具有政府间性质的文件阐明了各国为了保障获得充足食物的人权而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然而，至今世界上仍有 10 亿人口在挨饿。至少有 20 亿人口缺少维持健康而积极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微量营养。在发展中国家，缺乏铁、维生素和锌仍然居于疾病致死十大

为尽量减轻粮农组织工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实现对气候变化零影响，
本文件印数有限。敬请各位代表、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勿再索取副本。
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互联网 www.fao.org 网站获取。

主要原因之列。在这些国家，三分之一的儿童身体矮小，一半婴儿出生时母亲患有贫血症。

这样的现实固然令人遗憾，但这并不说明《自愿准则》是无效的，而只是说明我们未能有效地加以实施。准则是根据在 1996 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出现的国际社会的信念建立的，这个信念是，我们在应对全球饥饿的问题时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粮食生产的问题，更需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加深分配不平等和社会不公的边缘化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再次吸取的一个教训。在当今世界，粮食产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然而饥饿人口仍是有增无减。原因何在？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增加粮食供应，却忽视了我们生产粮食的方式所产生的分配影响，以及长远的环境影响。我们在提高产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却仍然无法解决饥饿问题；必须认识到，产量的增加虽然是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的条件；必须认识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大规模地提高了各个领域的产量，却同时也为二十一世纪的严重生态灾难种下了祸根。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膳食的变化，要满足地球的粮食需求，我们必须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来为农业服务。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个目标，势必重蹈覆辙。无论我们增加多少粮食产量，都无法改变如今正在挨饿的 10 亿人的命运；不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穷得根本买不起可以供应的粮食。因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在哪儿做错了？

当前面临的世界饥饿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生产方式，使得小规模农耕普遍不可行，充其量只能归入生计农业。小农只能得到最劣质的土地——通常是在山区、干旱地区和易受侵蚀的地区，因而没有竞争力，被推到了边缘地位：他们的政治权利得不到重视，因为他们不易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经济力量也不被看重，因为他们不能进入全球供应链，也不能带来外汇收入。他们被视为无关紧要而在公共政策中被遗忘了。我们当然知道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农村人口大规模逃离。今天超过 10 亿人——也就是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 43%——已经生活在贫民窟，到 2030 年，当全球人口达到 80 亿时¹，这个比例将增加到三分之一²。这些城市贫民中的绝大多数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留在农村的那些人往往不得不依赖生计农业为生，仅能勉强生存而已。他们通常被迫出卖、甚

¹ 在整个二十世纪，世界人口从 16.5 亿增加到了 60 亿，并且在 60 年代后期经历了人口增长率的最高峰（平均每年 2.04%）。最大的世界人口年增长量（8600 万）发生在 80 年代后期。目前的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 1.2%，年增长量将近 7500 万。在下一代，非洲将出现最快速的人口增长，这个洲目前的人口为 10 亿，将每年增加约 2400 万，到 2050 年将翻一番。

² 联合国人居署，关于在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城市化挑战和减贫的国际三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内罗毕，2009 年 6 月 8—10 日，HSP/EC/ACP.1/4，2009 年 6 月 2 日。

至遗弃自己的土地，成为没有土地的劳工，靠在大农场打零工为生。如此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不难理解的；众多的人口买不起市场上供应的粮食。从历史上看，饥饿往往发源于大量的小农被剥夺了生计。这不是天灾，而是一个发展过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也是可以改变的。

面临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我们不免会把充足食物权看作是一项长远的目标，认为这个目标能实现当然很好，但是眼下显然鞭长莫及，因此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这种想法反映出对充足食物权真实内涵的根本误解。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充足食物权会发挥更核心的作用。这不仅是一个目标，还可以从中看到实现目标的进程。

I. 首先关注最弱势群体

充足食物权对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把最弱势群体的苦难当作出发点。我们不能继续高高在上地只盯着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应该赶快关心在田里劳动的人或者在城郊以小买卖为生的人的境遇。穷苦农民不会到芝加哥交易所做买卖；贫穷的消费者只会在当地的农贸市场而不会到商品交易所去买糊口的大米。由于我们没有这样来看待饥饿问题，我们就看不到粮食生产和分配链中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总是把饥饿问题看作供需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不法雇主和不法商人的问题，是越来越集中的投入物供应者部门的问题，或者是扶持穷人的安全保障不足的问题。因此，《自愿准则》要求我们首先做出粮食不安全和易受害信息的图表。只有了解了谁在挨饿，为什么挨饿，居住在哪儿，我们才能设计出真正有效的政策来消除或减少阻碍他们享受充足食物权的障碍。然而在许多国家，获得可靠的数据仍然是一大挑战。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在改进信息收集和促成危机早期反应方面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³。但是总的来说，关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数据通常仍是残缺不全或过时的，或者是统计的方法有问题。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数据，有时也可能被政策制定者所忽视或掩盖，因为他们希望以所谓的“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为借口而保持无动于衷。为了可以无所事事，他们必须一无所知。

以充足食物权为基础抗击饥饿，还要求我们设计出能够让每一个人可以没有障碍地享受到这个权利的政策⁴。《充足食物权准则》呼吁通过国家战略来明确界

³ 粮农组织的全球信息及预警系统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追踪当前及近期的粮食形势，并提供即将发生的危机预警。同样，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作物和粮食供应联合评估组提供关于发生危机的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以及人道主义需求—的最新评估。

⁴ 特别参阅 Arjun Sengupta, ‘The Right to Foo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收入 Wenche Barth Eide and Uwe Kracht (编), *Food and Human Rights in Development, vol. II: Evolving Issues and Emerging Applications*, Intersentia, Antwerpen-Oxford, 2007, 第 131 页; 和 Sibonile Khoza, ‘The Role of Framework Legislation in Realising the Right to Food: Using South Africa as a Case Study of this New Breed of Law’, 收入 Wenche Barth Eide and Uwe Kracht (编), *Food and Human Rights in Development, vol. I: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and Selected Topics*, Intersentia, Antwerpen-Oxford, 2005, 第 187—204 页, 第 196—197 页。

定应该采取哪些行动，由哪些人负责，在哪个确切的时间框架内完成，根据哪个具体程序进行。这样的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可以确保调集到适当的资源，可以促进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以保证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诸多（而且是互相关联的）原因都能得到统筹兼顾。它们也能加强问责制：通过指定角色扮演者，规定职责，可以让民间社会组织和独立机构—例如国家人权机构或法庭—更好地监督政府机构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也可以让公诉人或议会督导机构在政府机构始终工作不力时进行干预。这样的国家战略还有利于集体总结经验教训：因为要通过适当的指标来监测进展，所以偏离方向而不能取得成果的政策可以及早得到纠正。最后，由于这样的战略具有参与性和包容性，因而有助于推动民主化和赋权—如果把这些战略纳入框架法律则更是如此，就像巴西、危地马拉或尼加拉瓜的做法那样—可以限制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专断或偏袒倾向，确保决策是根据最终受益者所表达的实际需求作出的。

因此，充足食物权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做事的方式，是自下而上，而不是从上到下的，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家垄断的，是鼓励参与而不是排斥的。不过，充足食物权也是一套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法律权利，要求国家承担一系列明确的义务。国家必须尊重充足食物权；必须保护这种权利不受私人的干扰；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来实现充足食物权。从南非⁵到印度⁶，从柬埔寨⁷到尼泊尔⁸，法庭已经越来越理解其必须保护充足食物权的职责。这一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著地成为最弱势群体利益的关键保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各地众多穷人的生计将发生迅速而决定性的转变，我们决不能失败。我们依据充足食物权来作出选择，就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走向更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

II. 新农业投资和国家尊重充足食物权的义务

首先，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因为全球粮食、能源和气候危机导致对投资农业的兴趣重新高涨。在2005—2007年期间，农业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900年代的每年6亿美元剧增至每年30亿美元⁹。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农业投资

⁵ 参阅南非高等法院，*Kenneth George and Others v.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and Tourism*, 2007年5月2日。

⁶ *Supreme Court of India, 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 and Another v. Union of India & Others*,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Civil Original Jurisdiction, Writ Petition (Civil) No. 196 of 2001*, 2003年5月2日裁决。

⁷ *Corte Constitucional, Acción de tutela instaurada por Abel Antonio Jaramillo y otros contra la Red de Solidaridad Social y otros*, Sentencia T-025/2004。关于这个例子及南非和印度的例子，参阅 *Christophe Golay, The right to food and access to justice. Examples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粮农组织，2009年。关于法庭在捍卫充足食物权中的作用的一般情况，亦可参阅 *Marco Borghi and Letizia Postiglione Blommenstein (编),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and Access to Justice*, Bruylant / Schulthess, Bruxelles/日内瓦，2006年。

⁸ 2008年9月25日，尼泊尔最高法院根据临时宪法颁布了一项临时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尼泊尔政府必须立即向12个粮食短缺地区供应粮食。

⁹ 贸发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年9月17日。

可以在减轻贫困中产生很大影响。如今粮食系统遭遇如此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农业投资严重不足¹⁰。

但是，这些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威胁。炒卖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有时迫使缺钱的农民经不起价格的诱惑而卖掉土地，暴露出市场化的土地改革的软肋。在不少投机者的推动下，大规模的土地租赁或收购越来越普遍。一些发达国家推行的财政奖励和津贴触发了一股生产生物燃料来取代矿物燃料的热潮。一些面临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速的国家，更由于自然资源的严重消耗，把大规模收购土地看作实现长期粮食安全的途径。他们也担忧淡水的供应，因为在许多地区淡水已成为稀缺商品。对热带国家的某些原料商品，尤其是纤维和其他木材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最后，因种植人工林和避免毁林而预期可得到的碳储存补贴，也增加了农田在投资者眼中的价值¹¹。有些对农田的投资，尤其是出自私人投资基金的投资，纯粹是投机行为。

投资者的到来可能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但到头来也可能让他们葬送生计。非洲生物燃料有限公司在加纳收购了23700多公顷的土地，据说迫使塔马利地区七个村庄的居民（全部是农民）流离失所。在乌干达，荷兰的FACE（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排放）基金会协助种植了25000公顷的树木以吸收二氧化碳，由此抵消了荷兰一个600兆瓦燃煤电站的碳排放量，然后将抵消的排放量出售给“绿色乘坐”（GreenSeat）——这是一家与西方客户做碳抵消交易的荷兰公司，其客户主要是航空公司。不过，这个项目最近引起了争议，因为据称为了给植树项目腾地方，一个名为本内特的土著民族被迫流离失所。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许多土地都是政府拥有，土地使用者对自己耕作的土地并不拥有财产权；还有不少类似的情况，由于财产权和使用权的关系错综复杂，耕地的人并不拥有土地，虽然他们并不一定以现金或实物交税，也并不一定与名义上的拥有者之间签有正式协议。如果把他们赶走，他们将无法诉诸法律补救，也得不到适当的赔偿。还有一些人利用土地从事其他活动，例如放牧和采集木材——这些都可能是重要的生计来源，特别是对妇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游牧业特别重

¹⁰ 2004年，在依赖农业的国家，农业公共支出占农业GDP的4%，私营和公共部门对农业的投资总额，包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的投资，连续20年下降，直到最近才开始回升（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2007年10月19日，第7页；并参阅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The World Bank's Assistance to Agriculture in Sub-Saharan Africa: An IEG Review, 200710月）。

¹¹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尤其如此。清洁发展机制允许承诺按照《京都议定书》减少排放或限制排放的国家（附件B缔约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以挣得认证减排积分，每一积分等于1吨二氧化碳。认证减排积分是可以交易的，也可以在计算是否达到京都议定书目标时使用。

要，全世界总计1.2亿牧民/农牧民中近一半居住在这个次大陆地区，其中苏丹和索马里的牧民/农牧民人口最多（各为700万），其次是埃塞俄比亚（400万）¹²。那么，还有哪一片土地是“闲置的”呢？还有哪一片土地可以留给投资者呢？投资的条件是什么？任何一个人，只要被剥夺了维持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源的机会，就是侵犯充足食物权的受害者，不论是否采取了赔偿措施。

III. 粮食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和保护充足食物权的义务

充足食物权之所以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的粮食供应链发生了变化。各国政府不仅要尊重充足食物权，确保没有一个人被剥夺获得生产资源的现有权利，而且还要保护充足食物权，控制私营行动者，以防止其行为导致此种现有权利受到侵犯。

为了理解充足食物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所在，我们不妨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典型小农为例来思考一下。设想她只拥有一小块土地，面积大约为1公顷或2公顷，土壤相对贫瘠，且得不到灌溉：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最好的土地已经被大规模种植园占用，而她的丈夫可能就是在收获的季节到这样的种植园打零工。收获的作物不够满足全家人一年糊口的需要。然而，在过了收获期之后，她只好留下够一个月吃的口粮，把剩下的全部卖掉，因为如果不卖掉，这些粮食没有地方储存，还没来得及吃就会腐烂。她只能把粮食卖给中间商，而价格是由中间商决定的。价格当然很低，但是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她无法把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去卖。为了弥补损失，她不从商业部门购买种子，而是从去年收获的作物中留下一些作为种子，偶尔也会和社区的其他农民交换种子。她不使用肥料，因为肥料价格过于昂贵，短短两年已经上涨了40%。她靠务农养家，虽然她知道务农甚至连保本都很难：三个月之后，她又只好用出售部分收获的作物而得来的一点点钱到市场上去购买食物，购买的价格很可能是她自己出售时的两、三倍。

目前全世界至少还有15亿人都处于这种境况，他们靠小规模耕作维持生计，通常处于饥饿状态¹³。怎样才能帮助这些人改善生计？有一个办法，为一代政策制定者所津津乐道，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模式。这个词语最早出自美援署主任威廉·高德在1968年发表的一次著名讲话，当时他描述小麦和水稻新技术在

¹² Nikola Rass,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vulnerability of pastoralists in Sub-Saharan Africa*. PPLPI (扶贫畜牧政策举措，粮农组织)工作文件第37号，2006年，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www.fao.org/ag/AGAinfo/programmes/en/pplpi/docarc/execsumm_wp37.pdf。

¹³ 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Agriculture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2007年，第3页。

整个亚洲的迅速推广是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他说，“这既不是像苏联那样的红色暴力革命，也不是伊朗那样的白色革命。我宁愿称之为建立在科学技术应用基础上的绿色革命。”然而，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语不免有些犹豫，因为目前被冠以同一名称的那些计划与原先所设想的模式有一些显著的区别。所谓“绿色革命”，最初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43年在墨西哥发起，随后在6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南亚地区，其基本理念是开发和推广新品种，尤其是半矮秆小麦和水稻品种，扩大土地灌溉面积，以及大幅度增加使用化肥和机械化¹⁴。公共部门在上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免费分发或得到补贴的改良种子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今“绿色革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再次传播，那儿正在努力发起类似的变革，可相比之下，现在那儿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的质量，远远不如当时。

“绿色革命”之所以受到称赞，是因为在其开展的地区粮食产量显著增加，甚至还避免了饥荒——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具备必要条件的区域，“绿色革命”促使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提高粮食产量还不足以根除饥饿。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对20世纪几次最严重的饥荒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结论：在粮食产量大增的时期也可能发生饥荒，原因在于某些人群的收入持续过低，而有些人群的收入却不断上升¹⁵。他的研究方法的创意在于，考虑的重点不再是衡量总值的因素，而是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处境——只要生产水平的提高不能使这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那么无论在提高产量方面取得什么成就，其本身都无法减轻饥饿。因此，我们必须问的问题不仅是某些形式的农业发展是否能增加产量，而且主要是产量的增加会产生怎样的分配影响。谁将获得最大利益？谁将无法获益？谁可能还会蒙受损失？

从实现充足食物权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才是决定性的。甚至“绿色革命”之父诺尔曼·布劳格（他因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而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绿色革命”的成功充其量只是局部性的成功。他在2004年指出：“很明显，相对于条件较差的雨育地区，灌溉区域的财富增长更快，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¹⁶。”或许这个说法也还不免含蓄。“绿色革命”

¹⁴ 关于绿色革命可特别参阅 Norman E. Borlaug, *The Green Revolution Revisited and the Road Ahead*, Special 30th Anniversary Lectur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Oslo, 2000 年; Gordon Conway, *The Doubly Green Revolution: Food for All in the 21st Century*, Cornell Univ. Press, Ithaca, New York, 1999 年（初版 Penguin Books, London, 1997 年）。

¹⁵ A.K.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Univ. Press, 1981 年。

¹⁶ Norman Borlaug and Christopher Dowsell, 'The Green Revolution: An Unfinished Agenda', CFS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20–23 September 2004 年 9 月 20–23, 第 7 段。

导致土地集中到了一些企业家型的大农场主手中，当新兴的资本化农业带来了生产力发展时，这些农场主便可以从中获得最大利益¹⁷。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的贫困农民却未能从中获益。妇女基本上无缘受益，因为妇女比男人更难获得信贷，她们获得推广服务的支持也更少，因而无力承担技术革新所必需的投入¹⁸。“绿色革命”有时反而让缺钱的农民陷入对高价值外部投入的依赖，而事实证明这些投入对很多人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绿色革命”推动了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农业模式的转变，从而加速了农村人口因缺乏替代性工作而不得不逃离农村。粮食生产的增加可能同时造成严重的不平等现象¹⁹。在1970—1990年期间，南亚的人均粮食生产增加了9%，饥饿人数也同样增加了9%。在同一期间，南美的人均粮食供应增加了8%，但饥饿人数却增加了19%²⁰。

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首先，我们不能将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存在着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这些不同的模式对农村收入结构造成的影响也千差万别，并不一定会促进公平。其次，我们不能忽视目前的粮食生产和分配体系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例如，目前全球十大种子公司占据了全球专有种子市场67%的份额，其中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独家就占有了23%，而前三大种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7%²¹，因此有一个问题就值得一问了：我们今天是否还可以去推广新品种的种子而逼迫农民深陷这样的市场结构？我们难道不应该把如此集中的种子市场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而仅仅只是关注垄断特权所造成的没有机会获得技术的问题？在如此异常的高度集中的市场

¹⁷ Donald K. Freebairn 的一篇评论中对此特别强调，该评论显示，在30年来关于绿色革命的80%的研究中，考虑公平问题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向技术的转移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增加：参阅 Donald K. Freebairn, 'Did the Green Revolution Concentrate Income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Research Reports', *World Development*, 1995年，第23卷，第2期，第265—279页。

¹⁸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Women: The Key to Food Security, 8. Findings*, www.ifpri.org/pubs/ib/ib3.pdf

¹⁹ 关于绿色革命的主要途径，参阅 Eric Holt-Giménez and Raj Patel, *Food Rebellions! Crisis and the Hunger of Justice*, Pambazuka Press, Food First Books, and Grassroots International, 2009年，第26—37页；Vandana Shiva, *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Third World Agriculture, Ec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1991年；Tony Weis, *The Global Food Economy. The Battle for the Future of Farming*, Zed Books, London and New York, and Fernwood Publ., Halifax, 2007年，第107—109页。

²⁰ Eric Holt-Giménez and Raj Patel, *Food Rebellions!*, cited above, 第27页 (citing Frances Moore Lappé, Joseph Collins, Peter Rosset, and Luis Esparza, *World Hunger: 12 Myths*, Oakland,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86年)。

²¹ ETC小组, *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November 2008年11月，第13页。贸发会议秘书处注意到，投入物提供商部门的集中现象显著加剧，从种子扩展到了所有农业投入物—由于合并和并购，农业化工公司已经开始从事生物技术和种子生意，导致了“农业市场的关键分支（农业化学、种子和农业生物技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汇聚”，而这些部门的公司之间签署的承包协议则更强化了这一进程。参阅 *Tracking the trend towards market concentration: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al input industry*,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2006年4月。了解进一步的发展及更新的材料，可参阅特别报告员在联合国大会第64届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充足食物权的报告 (A/64/170), *Seed policies and the right to food: enhancing agrobiodiversity, encouraging innovation* (2009年10月)。

情况下，导致更为依赖高价值技术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再次，也许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人人参与，才能实现人人共享。正如决心解决饥饿问题的“绿色革命”并没有获得成功的事实所表明，只有在制订和实施公共政策时把参与放在核心地位，我们才可能更有机会真正满足穷人的需求，更有机会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同时根据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不断进行修订。

确实，目前围绕“绿色革命”而展开的谈话中或许最突出的一点是，没有探讨支持农业的替代方法，尽管替代方法事实上有可能更好地回答一个问题：即劳动环境最为艰难的某些小农经营者究竟需要什么才能改善生计。在一些国家，“绿色革命”有效地替代了土地改革，也就是说，并不采用把土地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的方法来刺激粮食增产，而是利用技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还可以实施其他一些政治敏感性并不这么强的措施，这些措施也可以显著改善小农经营者的生活，而且可能比采用技术性对策更具可持续性。

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体制革新和公共物品的供应。让我们再次以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在一小块土地上耕作的非洲妇女为例来思考一番。这位妇女所需要的是能够把自己收获的作物卖一个更好的价钱，还需要在生产能力上获得支持。我们可以推行在村一级建立合作社，既可以提高她与从中牟取暴利的中间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又可以促进她及其他村民的赋权。我们还可以促使他们得以在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方面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或许还能够帮助他们开始从事食品加工，从而走向价值链的高端。我们可以改善通信线路和价格信息，给予她更多的选择余地，因而使她有能力做成更好的交易。通过在当地建立储存设施，我们使她能够选择何时出售自己收获的作物，而不必非得在收割后几个星期内，也就是价格最低的时候，就急于脱手。通过发展推广服务并确保这些服务到达她的村庄，我们可以向她及其他村民更好地传播适于当地环境条件的最佳耕作做法——日本正是通过向农业社区提供这样的支持才得以走上成功的发展之路。通过建立一个公共系统，以对农民有足够利润的价格购买一部分主要粮食作物，我们不仅可以确保私营商人在压力下不得不提高所付的价格，还可以促进建立粮食储备，以此限制收割季节和旱季之间的价格波动。当然，承担这个任务的机构必须秉公履行职责，并且要让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参与其中。我们可以实施具体的支持方案专门支持小农经营者，例如提供低息贷款或选择小农经营者承包学校供膳项目（巴西近期就采取了这两种措施），确保依赖小规模耕作的农民可以从中获益。这些改革可以对提高最贫困农民的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些改革是体制性的，而非技术性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而不是为私人投入

物提供补贴。实施这些改革，国家可以履行保护充足食物权的义务。除非遭遇自然灾害或内乱，否则充足食物权并不是填饱肚子的权利，而是有尊严地养活自己的权利，对于这位依靠自己收获的作物为生的妇女来说，充足食物权就是以使自己一家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方式生产粮食的权利。

IV. 环境挑战：在本世纪实现充足食物权

“绿色革命”的方法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去想象农业革新的其他补充方法，原因之一是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法被大范围地测试过。但是这也表明，我们对进展的理解是单线条的：当对“绿色革命”所取得的增产赞叹不已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些增产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所参照的标准不是农业发展的其他道路，而是毫无发展。我们不应该以没有革新为前提来衡量“绿色革命”的成功；我们应该将其优点与其他创新模式相比，不管这些创新模式是与“绿色革命”互为补充，还是相互竞争。但问题是，评价本身就困难重重。我们不应该将单一作物的增产作为进展的唯一标准，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更好的衡量标准是按间作田地的公顷数计算的总生产力（间作田地即指增加耕种不同作物的田地）。我们也不应该混淆盈利能力和生产力；虽然按活跃的劳动者计算，大规模机械化农业耕作和依赖单一作物是生产力很高的做法，但是按公顷计算，这种做法的生产力就比不上规模较小、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除非耕作单位小到不需要足够的注意力或劳力²²。更重要的是，不应孤立看待生产力，而应将其与对收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联系起来。小农经营者有利于粮食安全，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当地生产的食物可以避免购买食物通常会涉及的昂贵的运输和营销成本²³。而且，对大多数小农经营者来说，由于无法获得信贷和保险来减少与天气有关的损失，因此与高风险取得高产量相比，稳定获得合理的好收成更为可取。他们依赖间作的一个原因是，间作可以促进多样化和“组合效应”，从而限制风险，也因为有些意外事件可能会导致不可弥补的后果，比如永远还不清的螺旋债务等。

可以选择的是规模，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继续鼓励有限数量的大生产商集中进行粮食生产，或者是否支持小农经营者，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服务。不过，如今的选择还与农业生产的模式有关。在小农场上利用少量外部投入进行低度耕作；依赖间作而不是单一耕种；使用生物杀虫剂和粪肥而不是化学品，以抵抗自然灾

²² Nancy L. Johnson and Vernon R. Ruttan, 'Why are farms so small?', *World Development*, 第 24 卷(1994 年), 第 691—706 页。

²³ 经合组织, *Promoting Pro-Poor Growth: Agriculture*, Paris, 2006 年, 第 31 页。

害或给土壤施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有可能大幅提高产量的。在迄今影响最为深刻的一项跨国对比研究中，Jules Pretty和他的团队在57个发展中国家、总计3700万公顷的土地上调查了286个使用资源节约型技术的项目。调查发现，作物平均增产79%²⁴。这些调查结果接受了同行审查，并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上，该期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机构²⁵。使用这些技术可以使小农的收入获得可观的增加。种植固氮豆科植物或树木可以限制对化肥的依赖；而对大多数边缘农民来说，与利用高价值的外部投入相比，利用当地生产的资源可能更具有可持续性。

有许多范例可供选择。坦桑尼亚西部的希尼安加省和塔波拉省过去被称为“坦桑尼亚的沙漠”。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当地使用的农林技术和各种参与性进程使大约35万公顷的土地得以恢复利用。各个家庭每年获得的收益高达500美元。此外，农林计划提高了树木的利用率，从而改善了农业系统的复原力，这对于气候变化尤为重要。在马拉维，2005年约有10万名小农经营者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肥料树的使用。将玉米与固氮树木间作，平均每公顷田地的产量可以达到3.7吨—与之相比，未使用此类树木的田地每公顷产量仅为1.1吨，而且如果再少量添加矿物肥料，产量还可以增长到每公顷5吨。这一成功经验促使马拉维政府于2007年启动了农林粮食安全计划，该计划由爱尔兰援助署提供资金，以4.2万多个务农家庭为目标对象。目前该计划使马拉维约130万最贫困人口从中获益，以最低的财政资源投资提高了他们的粮食生产能力。内罗毕世界农林中心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使用肥料树可以减少多达75%的商业氮肥，同时可以使作物产量增长一倍或两倍。农林学还可以从大气中消除500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世界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总量的三分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用地中，至少有10亿公顷适宜转向碳农林项目。

此类可持续农业的科学基础就是农林学，这门科学是最佳农艺科学与生态科学相结合的成果。我咨询过的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农林学也许能够比现行农业方法更好地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巨大环境挑战。为农民提供各种更好的种子以及改进灌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采取更多措施改进农业系统，而这种支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为做出最佳选择，我们必须探索所有的可能性。支持农业的方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确保所有农民都能获得最符合他们自身具体需求的支持。

²⁴ Jules Pretty et al., 'Resource Conserving Agriculture Increases Yiel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第40卷(2006年)。

²⁵ Jules Pretty,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evidence', *Phil. Trans. R. Soc.*, 2008年2月12日, 第363卷第1491号, 第447—465页。

但是，在决定如何支持农业时，我们不可以低估未来环境挑战的严重性。第一项挑战就是气候变化²⁶。正如我们最近在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东非、印度²⁷或中美洲地区所看到的，气候变化已经在威胁着整个区域，特别是依靠旱作农业的区域维持农业产量实际水平的能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亚和南亚，气候变化将会影响降雨。还将增加干旱的发生频率，提高平均温度。农业生产可获得的淡水将会变少。根据开发署报告的估计数据，气候变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到2080年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将会增加6亿²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将扩大6—9千万公顷，而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2000年至2020年，非洲南部旱作农业的产量可能减少多达50%²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损失可以由其他区域的收益抵消一部分，但总体结果将是：到21世纪80年代，生产能力将降低至少3%，而且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二氧化碳施肥效应”³⁰，则生产能力的下降幅度将高达16%。William Cline认为，“保守估计全球农业生产能力到21世纪80年代（……）[可能]降低10—25%”³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损失将尤为严重，如果实现预期的“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其生产能力将分别降低17%和13%；如果不能实现预期的“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其生产能力将分别降低28%和24%³²。正如2006年的《Stern评论》所总结的：“在热带区域，即使小幅度的变暖也会导致产量下降。在高纬度地区，温度的适度升高将导致作物产量先有所增长，然后仍会下降。就

²⁶ 对农业面临的环境挑战的更完整描绘请参阅 Lester Brown, ‘Could Food Shortages Bring Down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Magazine*, 2009年4月22日。

²⁷ 由于受6月至9月的低于正常水平26%的弱季风的影响，印度626个地区中有252个遭受旱灾。对收获的影响在撰写此稿时尚未确知，但估计作物欠收可达15%至20%。

²⁸ 开发署,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Human solidarity in a divided world*, 2007年, 第90页(citing Rachel Warren, Nigel Arnell, Robert Nicholls, Peter Levy and Jeff Price,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为《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评论》撰写的研究报告, 研究工作文件第90号, 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Norwich)。

²⁹ 气候小组,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 Solomon, D. Qin, M. Manning, Z. Chen, M. Marquis, K.B. Averyt, M. Tignor and H.L. Miller, 编),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第9章。

³⁰ 这些包含二氧化碳在光合作用过程中的结合，利用太阳能使水和二氧化碳发生化合作用，产生碳水化合物，而氧成为副产品（定义摘自 William R. Cline, *Global Warming and Agriculture. Impact Estimates by Country*, 全球发展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07年, 第24页）。

³¹ William R. Cline, *Global Warming and Agriculture. Impact Estimates by Country*, 全球发展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2007年, 第96页。

³² 同上。亦可参阅 David B. Lobell, Marshall B. Burke, Claudia Tebaldi, Michael D. Mastrandrea, Walter P. Falcon, and Rosamond L. Naylor, ‘Prioritiz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Needs for Food Security in 2030’, *Science*, 2008年2月1日, 第319卷, 第607—610页(根据对12个粮食不安全区域的作物气候风险的分析, 表明南亚和南非这两个区域因缺乏足够适应措施而可能会有几种对众多粮食不安全人口很重要的作物遭受负面影响)。

像近期某些研究指出的那样，温度升高将导致全世界谷物产量大幅下降，特别是如果‘二氧化碳施肥效应’没有以前设想的那么大”³³。

这些研究结果可能听起来希望渺茫，但还是过于乐观了。这些研究结果没有考虑到洪水和干旱等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而这些事件最直接地证明了正在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尽管最近的天气预报和气候信息几次领先于自然的变化，比较可靠、准确和及时。而且这些研究结果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导致沿海的淡水含水层受到盐水的污染。最后，这些研究结果还忽略了灌溉用水短缺所造成的农业产量下降的风险。然而，诸如喜马拉雅山的大型冰川的融化可能使河流溢流，引发更多洪水，同时还会影响中亚和南亚众多人口的水源：到 21 世纪 50 年代，超过 10 亿人口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到 2050 年，中亚和南亚作物产量的降幅可能高达 30%³⁴。

尽管农业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但显然也是气候变化的一个诱因。不可持续的农业形式和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都在加速全球变暖的趋势，因为是它们主要造成了 1970 年至 2004 年我们所见证的 70% 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³⁵。全球范围内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³⁶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使用、毁林和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所导致的³⁷。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目前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方式引起的。每年由现代农业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 14%（其中肥料占 38%，家畜另占 31%）。土地使用的变化，包括毁林开荒发展农业，另占 19%。虽然森林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森林可以储存陆地上 45% 的碳³⁸，但目前正在受到大规模的破坏。

富裕国家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造成这种现状的部分原因。我们吃什么粮食决定了我们如何生产粮食。家畜生产的增加是为了满足我们对肉类的需求，却导致了大量的负面外部效应。2006 年，粮农组织公布了一项题为《牲畜的巨大阴

³³ 《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评论》，Nicholas Stern 著，预先在 www.hm-treasury.gov.uk 发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出版，2007 年，第 67 页。

³⁴ 气候小组，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上面所引，第 13 页。

³⁵ 气候小组，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Synthesis Report 2007'), 可在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ipcc.ch/pdf/assessment-report/ar4/syr/ar4_syr.pdf。

³⁶ 二氧化碳(CO₂)与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等一同是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同上）。

³⁷ 气候小组 2007 年综述报告；气候小组，第四次评估报告，工作组 III，第 1 章，2007 年。

³⁸ 关于适当的森林管理政策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参阅气候小组第四次评估报告，工作组 III，第 8 章，2007 年（在农业部分专门涉及减缓问题）。

影：环境问题与选择》的研究。该研究指出，家畜引起了 18% 的温室气体排放，大约是交通所引起排放的两倍。专门生产饲料作物和饲料的牧场和耕地共占全部农业用地的 70%，即全球陆地表面的约 30%。单单是家畜放牧就占用了 34.33 亿公顷土地，相当于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 26%，而且牧场面积的迅速扩大是造成毁林，特别是亚马逊河流域的毁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专门生产饲料作物的土地总面积达 4.71 亿公顷，相当于耕地总面积的 33%，而且这一数字正在迅速增长。目前大量的耕地正在用于生产作为家畜饲料的玉米和大豆，对巴西等国家的热带森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马逊河流域曾经是森林的土地当中，约有 70% 被用作牧场，其余土地的大部分都用于生产饲料作物。

这不是利用稀缺自然资源的最佳方式³⁹。今年早些时候，环境署公布了一份关于“环境在预防未来粮食危机方面的作用”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减少各工业化国家的肉类消费⁴⁰，并将 2050 年全世界的人均肉类消费量限制在 37.4 千克，即维持在 2000 年的水平，那么我们每年可节省约 4 亿吨谷物以用于人类消费。这足以满足 12 亿人口一年的热量需求。在一切照旧的设想方案下，2050 年之前，每年将有 15.73 亿吨谷物被用作非粮食用途，其中至少有 14.5 亿吨将被用作饲料——这一数量足以满足约 43.5 亿人口的热量需求。如果考虑到这一设想方案下所生产肉类的能量值，那么与将谷物直接用作人类粮食相比，将谷物喂养动物所损失的能量可以满足超过 35 亿人口一年的热量需求。

当然，情况没这么简单，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在工业化国家饲养家畜，每生产 1 卡的肉类或乳制品，需消耗超过 5 卡的饲料。在印度，要生产同样多的食物，则只需不到 1.5 卡的饲料。在肯尼亚，人们不用谷物喂养家畜，而是用人类无法食用的牧草或农业副产品喂养，家畜每年所生产的热量高于所消费的热量。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承认，家畜饲养这项不需要接受正式教育、不需要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活动，是大约 10 亿人口，即三分之一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不过我想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是，我们要制定粮食生产的各项量化指标，例

³⁹ Lester R. Brown and H. Kane, *Full house: Reassessing the earth's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年（提议主要依据环境考虑鼓励进一步扩大畜牧生产）。

⁴⁰ 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称的“下一次粮食革命”中，受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增加的推动，食肉消耗将在全世界继续上升：参阅 C. Delgado, M. Rosegrant, H. Steinfeld, S. Ehui, and C. Courbois, *Livestock to 2020: the next food revolution*,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粮农组织—国际家畜研究所, 1999年5月。然而，需要改变的是富裕国家的消费习惯，而不是贫穷国家的膳食多样化。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通人在 2020 年将消耗不到一半的谷物量，仅超过发达国家一个普通人消耗的肉产品的三分之一。

如，在 2050 年需要将肉类产量至少提高 2 亿吨，使之达到 4.7 亿吨⁴¹，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供需等式中需求的趋势如何，特别是现在，流行病学家一直警告我们，膳食中肉类含量趋高引起了各种公共健康问题⁴²。

气候变化也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唯一挑战。1996 年，粮农组织在 150 余份国家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有关世界植物遗传资源状况的报告》，对遗传多样性的丧失提出警告。报告指出，“现代化和商业化农业的普及，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⁴³。的确，农业的统一性和趋同性现象日益增加。人们齐心协力，开发有限几个高产的标准品种，因此目前所耕种的作物种类不超过 150 种；大部分人口现在以 12 种作物为食，其中 4 种主要作物（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占据了大部分份额⁴⁴。由于世界各地的农民放弃了种植地方作物，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单一遗传性、在特定条件下产量更高的作物，因此作物的遗传多样性丧失了约 75%⁴⁵。甚至作物自身的遗传多样性也在丧失。从实地以及全球来看，这降低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抗击虫害和疾病的复原力。

这些挑战与实现充足食物权直接相关。首先，通过我反复提到的办法，也就是扩大采用农业生态模式进行生产的规模，我们不仅可以向居住在最艰难环境中的贫困农民提供他们亟需的解决方案，还能为下一代保持水土，以及维持下一代自给自足的能力；我们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我们甚至可以储存碳。这样，农业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变成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次，应用各种战略来实现充足食物权，可以确保国家所采用的政策考虑这些相对长期的问题，并确保政策不会完全或主要受到短期获利预期的支配或出口机会的诱惑。再次，实现充足食物权的各项战略可确保问责制。各国政府仅仅保证会考虑其农业政策对气候

⁴¹ *Global Agriculture Towards 2050*, 为粮农组织高级别专家论坛撰写的讨论文件, Rome, 2009 年 10 月 12—13 日, 9 月 23 日。

⁴² 参阅 W. Zheng, T.A. Sellers, T.J. Doyle, L.H. Kushi, J.D. Potter and A.R. Folsom, 'Retinol, antioxidant vitamins, cancers of the upper digestive tract 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postmenopausal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第 142 卷, 第 9 期(1995 年), 第 955—960 页;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美国癌症研究所, *Food, nutr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ancer: a glob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1997 年; 卫生组织, *World Cancer Report*, Geneva, 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 2003 年, 第 62—67 页。这些研究阐述了饮食对患上某些癌症的影响, 包括大量食用动物脂肪和煮熟的红肉、少食水果和蔬菜等。亦可参阅 Tim Lang and Michael Heasman, *Food Wars. The Global Battle for Mouths, Minds and Markets*, Earthscan, London, 2004 年, 2007 年重印, 第 2 章。

⁴³ 粮农组织,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为 1996 年 6 月 17—23 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国际植物遗传资源技术会议撰写。

⁴⁴ José Esquinas-Alcázar, "Protection of crop genetic diversity for food security: political, ethical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Nature*, 2005 年 12 月, 第 6 卷, 第 946—953 页。亦可参阅 P.C. Mangelsdorf, "Genetic potentials for increasing yields of food crops and animals", *Pro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第 56 卷(1966 年), 第 370—375 页; Timothy Swanson, *Global Action for Biodiversity*, James & James Science Publishers, 2005 年(初版 Earthscan Publ., London, 1997 年), 第 52 页。

⁴⁵ D. Nierenberg and B. Halweil, *Cultivating Food Security*, New York, Norton & Co., 2005 年。

变化、土壤退化或生物多样性丧失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够的。违反这样的保证应该付出高昂的政治成本。问责制提高了这一成本，也就增加了说到做到履行承诺的机会。

V. 结论

我强调了三大挑战：农田的投机买卖、小农在成本上升和粮价下降的夹缝中挣扎，以及环境问题。这些挑战说明了充足食物权所包含的内容，而且三者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如果不进行细致监测，各项旨在提高产量的政策可能同时会加剧农村地区的不平等、贫困和边缘化现象。如果对投资者听之任之，他们的到来可能会破坏生计。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以及政府行为与市场脱钩，导致跨国和国内粮食生产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这会使小农陷入失败的境地。依赖大量的外部投入来发展大规模、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可能会产生大量负面的、没有被计入粮食价格的外部因素，这些负面的外部因素将小农经营者挤压到贫瘠土地和低价市场上，或导致他们完全丧失土地。有时，所有这些都是生产更多粮食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依照提高产量这一需求，以及可持续地提高产量这一职责行事，我们必须改善小农的生活状况，并限制农业所产生的生态影响。人类获得充足食物的权利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迫使我们关注最弱势群体的状况。它要求我们参与，要求实施问责制。它提出了各种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提高了我们对饥饿内涵的理解，以及如何抗击饥饿的认识。它可以更好地诊断哪里出了问题，以及怎样做才能最终消除饥饿这种不公正现象。只要共同努力，我们必将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 * *

Olivier De Schutter 于 2008 年 3 月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为联合国充足食物权特别报告员。他是不属于任何政府或组织的独立人士，直接向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报告。有关充足食物权特别报告员工作的更多详情，可访问 www.srfood.org 或 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food/index.htm。